

Summer 2015



# 亚洲研究动态

## Asia Research Network

June No.29

2015年6月 第二十九期



##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 29 期  
2015 年 6 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655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理事长

### 编委会顾问

林建华 北京大学校长  
邱 勇 清华大学校长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许宁生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理事长  
苏志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黄泰岩 辽宁大学校长  
朴永浩 延边大学校长  
吴朝晖 浙江大学校长  
Phung Xuan Nha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t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Artbazar Galtbayar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Tin Tun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李 越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周云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强一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yaw Nai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Javzan Batkhoo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 CONTENTS

## 目录



### P.02

→ 2015年5月23日，“上海论坛2015”年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次论坛聚焦于“亚洲的责任：创新合作模式”，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代表出席开幕式。



### P.07

→ 2015年4月21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2015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审议与评定中心2015年科研资助立项项目。

## 特稿

- 02 “上海论坛2015”年会召开
- 07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2015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

## 学术活动

- 08 韩中人文学会第36届国际学术会议召开
- 09 “剑桥—北外青年学者工作坊”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举行第五至七期
- 12 “《华裔学志》与西方汉学”学术研讨会召开

## 研究进展

- 13 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文化活动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启示
- 19 明朝土鲁番朝贡使臣职官封授考述
- 29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介绍



## “上海论坛 2015” 年会召开

2015年5月23日，“上海论坛2015”年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次论坛聚焦于“亚洲的责任：创新合作模式”，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代表出席开幕式。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刘劭

松，韩国高丽大学校长廉载镐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等出席论坛并致辞。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文文主持。

开幕式后，围绕本次论坛主题，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总裁亚库宁（Vladimir Yakunin），



屠光绍



许宁生



朴仁国



朱之文

斯坦福大学 Frank E. Buck 金融学荣誉教授、199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 (Myron Scholes)，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信军，中国前驻法大使、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建民，意大利前经济财政部长萨柯曼尼 (Fabrizio Saccomanni)，伦

敦国王学院客座教授、英国前大学与科学大臣戴维·威利茨阁下 (Rt Hon David Willetts) 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围绕世界、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外交、文化、社会、生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赢得了与会嘉宾的阵阵掌声。朴仁国主持了主旨演讲。



Vladimir Yakunin



Myron S. Scholes



梁信军



吴建民

5月25日，论坛闭幕。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分别在闭幕式上致辞。闭幕式前，论坛组委会专门邀请了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 Ben S. Bernanke 与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知

名经济学家张军教授进行高端对话，并举行了高端圆桌会议“中国经济再十年：财政、金融转型与经济增长”，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维森主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Adam Posen、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Fabrizio Saccomanni



David Willetts

本届上海论坛特别设置了9个高端圆桌会议，重点关注一带一路、亚投行、自贸区、老龄化、食品安全、信息社会等多个热点话题。在为期三天的会议和研讨中，与会代表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以专业的视角就以上话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交流与讨论，力求集政、商、学界之大成，为亚洲和全球合作发展中的众多热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

《2015年度上海论坛共识》在闭幕式上发布。《共识》认为，面对深刻变革中的世界格局和新经济态势，亚洲有智慧、有信心、更有责任为世界贡献新的合作模式，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世界必将因亚洲的创新而受惠，因亚洲的担当而走向共同繁荣。亚洲必须充分尊重各国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的探索，必须以创新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实践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寻找新的增长机遇，共同应对威胁和挑战。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亚洲重任在肩。

上海论坛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新型高校智库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论坛发源于2005年，九年来，共有海内外政、商、学界精英领袖逾万人次参会，论坛始终以“关注亚洲、聚焦热点、荟萃精英、推进互动、增强合作、谋求共识”为宗旨，为学界精英、政界领袖、业界翘楚的交流互动搭建平台，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为亚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与繁荣开拓新视野、贡献新力量，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号召力的国际性论坛。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Nicholas R. Lardy、Jacob Funk Kirkegaard 和 Paolo Mauro 等在高端圆桌会议发表主旨演讲。

本次论坛下设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治理五大板块，共21个子论坛。与往年相比，

摘编自

<http://www.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照片由上海论坛秘书处提供)

## 附：《2015年度上海论坛共识》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大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一个深刻变革与广泛调整中的世界，亚洲各国必须以合作的信念、创新的实践、共赢的信心来迎接新的挑战。上海论坛 2015 紧紧围绕着“亚洲的责任：创新合作模式”主题，就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相关重大议题展开广泛而深刻的讨论。责任是亚洲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创新与合作让亚洲速度继续引领世界。

**在创新安全合作新架构方面，亚洲任重道远。**亚洲的发展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繁荣，二是安全，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面对复杂的安全挑战，亚洲国家需要携起手来，更加有效地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要贡献。在此过程中，也欢迎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地区安全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在探索经济合作新模式方面，亚洲身负厚望。**随着新兴经济体普遍进入了调整期，亚洲经济增速回落也已成为新常态。亚洲国家应当坚持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理念，加强并创新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亚洲国家可以以“一带一路”建设等新型合作模式为抓手，利用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融资平台，加快开展亚洲

各国基础社会建设和互联互通建设，进一步减少贸易和金融往来的软硬件障碍，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奠定基础，加快市场一体化的形成，加强各国之间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经济和金融合作。

**在参与环境治理新行动方面，亚洲义不容辞。**亚洲在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同时，应加强对环境保护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合作，在巩固自身未来长期发展基础的同时为国际治理协作担当责任。亚洲国家应当继续探索碳市场的建立和完善，继续探索低碳转型的路径选择，继续合作加强亚洲国家在国际减排行动中的话语权和“碳”定价权。亚洲国家在北极地区日益频繁的船舶航行、能源开采等活动中亦应加强对北极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北极国家合作，共同降低未来北极生态所面临的风险。

**在应对治理模式新挑战方面，亚洲群策群力。**亚洲主要国家正在经历从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的重要转变，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把握科技创新前沿，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以发现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亚洲作为网络空间中重要的行为主体，应当探索新的合作和监管模式，在内部互联网治理上转变理念，从僵硬的“管

理互联网”转变到借助互联网这一“新工具”来解决“老问题”，探索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推进治理模式创新和国家执政能力现代化。

**在迎接社会发展新常态方面，亚洲协作共谋。**亚洲各国需要通过合作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分享，寻求公平高效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与食品安全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面对老龄化的压力，亚洲需要向世界各国借鉴学习：如何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解决跨区域移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的转移接续等问题；为应对食品安全问题，亚洲国家应当在科技创新的背景下，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携手构建政府监管、科技介入、企业自律、媒体监督、消费者参与的食品安全保障新模式，借鉴“食品安全云平台”等理念和方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产业链的完善。

上海论坛 2015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深刻变革中的世界格局和新经济态势，亚洲有智慧、有信心、更有责任为世界贡献新的合作模式，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世界必将因亚洲的创新而受惠，因亚洲的担当而走向共同繁荣。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亚洲重任在肩！

##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 2015 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

2015 年 4 月 21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 2015 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审议与评定中心 2015 年科研资助立项项目。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白淳、丁超、郭棣庆、李雪涛、李永辉、罗小东、陶秀璈、魏崇新、徐一平、张朝意、张宏等出席。中心副主任郭棣庆教授受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张西平教授委托主持了会议。

会上，郭棣庆教授汇报了自上届立项评审会议以来中心科研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宣布了 2015 年国际学术交流支援项目赴韩学者人选，通报了本年度学术著作资助出版立项专家匿名评审结果，介绍了本年度科研项目资助申报情况、资助额度安排及评审注意事项。

2014 年，中心资助的课题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发表论文 11 篇，出版学术著作 3 部：“亚洲研究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系列”《泰国现代文学史》、《缅甸历史、文化与外交》，以及《曾朴：文化转型期的翻译家》，与校内单位共同主办学术会议 5 次，举办“中国文化在亚洲”系列学术讲座 10 场，与剑桥大学东方文化学会联合主办“剑桥—北外青年学者工作坊”系列学术讲座 4 场。

本年度中心收到项目资助申报总计 23 项，其中课题研究 14 项，学术著作资助出版 1 项，



学术会议资助 8 项。经过与会委员的认真审阅，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最终评定出本年度中心拟资助立项的 22 个项目，其中课题研究 13 项、学术著作资助出版 1 项、学术会议资助 8 项。项目选题涵盖了哲学、比较文学、历史学、法学、语言学、教育学、图书馆情报学等 7 个学科领域。本校亚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语言与文化学院、法学院、网络继续教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法语系、西葡语系、日语系、计算机系、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 11 个学院、系部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参与了本年度的项目申报工作。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 韩中人文学会 第36届国际学术会议召开

2015年6月20日,由韩中人文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与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共同主办,唐山通达集团赞助的韩中人文学会第36届国际学术会议开幕式在北外举行。大韩民国驻华使馆公使参赞兼韩国文化院院长金辰坤、韩中人文学会会长朴胤雨、北外校长彭龙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次会议以“中韩交流与人文学翻译的方向”为主题,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宣读论文。

金辰坤表示,韩中人文学会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不仅能使两国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更加活跃,也能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贡献。他表示,翻译能够填补两国语言之间的间隔,是两国相互理解与协作的出发点,此次会议以“中韩交流与人文学翻译的方向”为主题,具有重要意义。

彭龙表示,翻译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途径,中韩两国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频繁的翻译往来,自两国建交以来,翻译更是对两国之间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人文学翻译则对两国人民增进互相了解、开展多方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信此次会议的举办,必将推动中韩人文学翻译取得新的发展。

朴胤雨表示,自1996年韩中人文学会成立以来,每年在韩国和中国各举办一次国际学

术会议,主要探讨韩中文化交流中的翻译问题,以推动两国文学、思想等领域的人文交流。希望本次会议通过讨论中韩人文学翻译领域的各种问题,从多个角度探索信息化时代对翻译新的需求。

延边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前院长崔雄权,北外亚非学院院长孙晓萌、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郭棲庆、教务处处长金利民、科研处处长张朝意、教育基金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刘博然,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会荣,唐山通达集团财务总监郑静,韩国城总经理肖海艳等中韩两国20余名嘉宾参加了开幕式。

韩中人文学会以活跃中国各大学韩国学相关研究为首要目标,受到韩国大宇财团和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资助。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成均馆大学、东国大学等多所韩国大学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等多所中国大学的人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均加入了该学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 “剑桥—北外青年学者工作坊” 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举行第五至七期

由剑桥东方文化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主办，北外研究生会承办的“剑桥—北外青年学者工作坊”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本学期继续举行。

2015年3月31日，第五期“剑桥—北外青年学者工作坊”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在北外阿语楼207教室举行。剑桥大学Michael Tai先生作了题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美关系的冲击”的演讲。Michael Tai先生用浅显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在场学生系统讲解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因，以及诸多相关的经济学知识，最后

发表了他对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关系的独到见解，并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最近大热的诸如“亚投行”等问题。讲座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学者与同学们展开了热烈的互动。同学们以全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了中美关系，在此次别具一格的讲座和探讨中受益匪浅。

Michael Tai先生精通六国语言，曾翻译出版过多本著作，也曾多次在剑桥大学等高校担任与中国问题相关的重要会议的现场口译员，对中美关系有着深入的研究。

5月6日，“剑桥—北外青年学者工作坊”



系列学术交流活动第六期举行。剑桥大学王俐晴女士作了题为“跟着音乐动！身体律动与音乐的关联”的演讲。

王俐晴女士通过视频展示和实验分析，说明除了演奏音乐必须的动作外，身体律动也是人自身的一种本体感觉，它有助于演奏者和听众抓住节奏。她指出随音乐而动是感情的自然表现，它使演奏者的表演更具张力，同时也能令听众更好地融入到音乐之中。考虑到国内观众的需要，王俐晴女士特意准备了昆曲、古琴、南管、北管等中国传统音乐的例子。在解读古乐谱记法和传统音乐表现手法的过程中，在场的观众更直观地理解了音乐与律动的相关性，大家收获颇丰。

王俐晴女士本科毕业于台湾大学医学院物理治疗学系，在取得学士学位与物理治疗师执照后，就任台大医院临床物理治疗师与研究助

理；随后于台湾大学文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并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担任研究助理，从事脑磁波 (MEG) 与声音感知的研究。目前，王俐晴女士是剑桥大学音乐与科学中心的博士生，也指导大学部同学修习《音乐与科学概论》的课程，主要研究人在听音乐时不由自主跟着动的现象，以及身体律动对音乐认知的影响，同时也关注音乐与文化的议题，希望将来能一方面将现有成果推广到医疗层面的应用，另一方面着手更多跨文化的研究。在工作与研究之余，王俐晴也持续接触与学习不同类型的音乐与舞蹈，例如古典音乐、爵士钢琴、古琴、南管、歌仔戏、中东肚皮舞与印度古典舞等等，并将所学与研究结合。

5月15日，“剑桥—北外青年学者工作坊”系列学术交流活动第七期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剑桥大学工程系 Mark Douglas Ainsie 博士



作了题为“Superconducting Applications for Electrical Power Systems”的演讲，与现场师生分享了关于超导体研究的最新发现。

Ainse 博士介绍了超导体材料研究的最新进展。超导是指导电材料在温度接近绝对零度的时候，物体分子热运动下材料的电阻趋近于 0 的性质。“超导体”是指能进行超导传输的导电材料，由于其电阻为零，传输电力的时候损耗极小，是节能社会的理想材料。以前，生产超导材料成本高昂，因为必须使用液氮将温度降低到接近绝对零度才能引发超导现象。这也限制了超导材料的广泛应用。Ainse 博士及他在剑桥的实验室团队通过反复实验，使超导现象出现的温度环境大大提升，降低了生产超导材料的成本，创造了世界纪录，研究成果在不远的将来有望实现量产化，为人类社会带来福音。

Ainse 博士本科毕业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大学，在东京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于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为剑桥大学工程系实验室专职研究员。

“剑桥—北外青年学者工作坊”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旨在为剑桥—北外两校青年学者提供一个跨文化、跨学科交流的学习平台，希望两校青年学者通过对语言学习和其他文化问题的研究和交流，拓宽视野，加深彼此的了解与合作，增进两校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学术对话，相互砥砺、共同进步。“剑桥—北外青年学者工作坊”系列学术交流活动拟举办 10 期，现已连续举办 7 期，按计划，每月举办一期，邀请来自剑桥大学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青年学者与北外师生进行学术交流。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 “《华裔学志》与西方汉学” 学术研讨会召开



为纪念《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创刊 80 周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台湾辅仁大学华裔学志汉学研究中心、德国奥古斯丁华裔学志研究院联合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协办的“《华裔学志》与西方汉学”学术研讨会于 2015 年 5 月 6—7 日在北外召开。《华裔学志》是 20 世纪 30 年代辅仁大学主办的汉学期刊,直至今日仍是汉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期刊之一。该刊现由德国奥古斯丁华裔学志研究院编辑。

北外党委副书记姜绪范在开幕式上致辞。他指出,学校有着将中国介绍给世界的优良传统,并愿同海内外的相关机构、刊物、学者合作,更好地促进中西学术的交流。台湾辅仁大学财团法人执行董事柏殿宏教授、《华裔学志》现任主编魏思齐教授、北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任大援教授作为主办单位代表致辞。

主旨报告环节,魏思齐主编回顾了《华裔学志》的创刊历程。台湾辅仁大学老校长陈垣先生后人陈智超研究员介绍了陈垣校长与该刊的创办者德国学者鲍润生的交往,并对其在该刊所发表的文章进行了总结。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黎建球教授评述了辅仁大学和《华裔学志》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北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张西平教授介绍了该刊在中国文化传播上的贡献和特色。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教授分析了该刊近 30 年来若干独特主题。在两场研讨会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高校及学术机构的学者从该刊的多个方面展示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 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文化活动 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启示<sup>1</sup>

李真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 一、导言

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追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发轫与轨迹，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回到中西初识的原点，在中西两种文化相遇和交流的历史脉络中梳理出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历程和特点。

15世纪末期，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中西交通再度复兴，展开了世界文明交流的新纪元。中国重新经由航海家、商人、传教士、外交使节的笔述、口传再次唤起了欧洲人的注意。16世纪中叶开始，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此揭开了近代以来欧洲与中国接触和对

<sup>1</sup>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近代汉学中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传教士视角”的研究成果。

话的序幕。以耶稣会士为主体的来华传教士在欧洲和中国两个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展开了对中国的研究，用西文写作的各种作品，为当时的欧洲提供了关于中国较为准确的信息，构成了欧洲早期中国知识的来源，对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尽管中西早在马可·波罗时代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过频繁的贸易往来，各种物产商品的流通相当发达，但直到16世纪双方才从一个物质交流的层面进入到了思想文化交流的层面，中国和欧洲从这时起才开始真正有了完全意义上的文化接触。互动的交流，相互的影响，共同的创造，是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根本性特点。故而，从16世纪到18世纪以“中学西传、西学东渐”为标识的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此阶段，作为中国文化的探险者和传播者，来华耶稣会士沟通中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二、来华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

众所周知，为中国文化西传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除了中世纪的马可·波罗，首推晚明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其次就是以“国王数学家”为代表的法国耶稣会士。可以说，来华耶稣会士带给欧洲人的震撼不下于马可·波罗，中国恰恰如美洲地理新大陆的发现一样，在精神领域上，对欧洲人而言，也是一块文化的新大陆。

**故而，从16世纪到18世纪以“中学西传、西学东渐”为标识的明清时期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此阶段，作为中国文化的探险者和传播者，来华耶稣会士沟通中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15世纪开始，天主教传教士大量被派到海外传教，他们所去的地方多是非洲、美洲等国力较弱的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必考虑当地人的感受，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向他们传教。当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时候，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华帝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对这样一个国家，如仍采用我行我素的办法传教，显然是行不通的。要想进入中国，唯一的办法是先向中国学习，让中国接纳他们。因此从利玛窦开始，耶稣会士入乡随俗，习华语，着儒服，与中国人打交道，深入了解中国的礼俗、社会和民情，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方法。在利玛窦看来，传教不只是单方面的信仰输入，而应当变成一种文化对话。利玛窦摒弃了欧洲中心主义，制定了科学传教的方式和文化适应的策略，坚持尊重中国传统，阅读中国古籍，学习中国文化，广泛结交文人士大夫，

为在华传教创造有利条件。在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身上，体现出了中西文明在相遇与对话的早期所遵循的几个原则：平等、尊重和适应。

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耶稣会士以士大夫阶层为传教对象，通过自上而下的影响开展传教事务。他们以中国皇帝为突破口，试图取得其信任，建立良好关系。如利玛窦被万历皇帝留任宫中修理钟表，教授西琴；汤若望与顺治帝情同父子，掌管钦天监，被尊称为“玛法”。再如1687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出五位精通科学的法籍耶稣会士来华。洪若翰、张诚、白晋、李明、刘应均均为博学之士，在科学方面造诣深厚，精通天文、数学、历算、测绘等领域，被称为“国王的数学家”，来华后深得康熙帝宠信和器重。他们不仅为康熙教授西学，还被任命在宫廷中担任不同工作，如在钦天监任职，充当外交谈判翻译、测绘地图、修建园林、铸造火器、修理钟表、奏乐绘画、制造西药等等。

耶稣会士以西学奇器为敲门砖，向中国皇帝、士大夫文人介绍欧洲文明和近代科学技术；同时也以极大的热情学习中国语言文字，译介中国古代典籍，向欧洲介绍有关中国的各种知识。他们在华活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传布教务；用技艺为清廷服务；向中国介绍西学；研究并向欧洲介绍中国。后两项活动正是“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耶稣会士在相距遥远的中国与欧洲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



梁，在西渐东传的历史潮流中，将东西方的思想文化连接起来，直接推动了全球化初期中西思想文化的相遇、对话与交流。

### 三、来华耶稣会士推动西学东渐

耶稣会海外传教之重要方式，即将“科学与理智灌输给知识阶级”<sup>1</sup>。明清之际，这种方法在中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明代除《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外，科学著述实属凤毛麟角。到明末新航路开辟后，随着传教士入华，西学逐渐流入东土，士大夫开始接触并学习天文与数学，形成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新景象。<sup>2</sup>明末清初西学

传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传统思想发生巨变之际。晚明以来中国思想界不满王学的空疏，倡导实学，又恰逢时局动荡，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儒家学者开始关注天文、数学、地理、兵器、机械与水利等实学内容，对传教士适时引入的西方近代科学产生了兴趣。传教士所介绍的西学在知识分子阶层大受欢迎，学习西洋历法、数学、机械等新知成为文人与传教士晋接的主要原因。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欧洲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西方传教士单向的传授过程，中国学者也积极地参

与了西学在华的传入与传播。他们向传教士学习科学知识，合作翻译近代科技书籍，创造了相关的中文科学术语。像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中国学者一方面对中外知识进行重构，另一方面利用西学来经世致用。来自欧洲的科学技术被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知识分子共同作用，融入到中国文化传统中，中西知识体系也进一步被融会贯通。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相遇之时，传入的西学与中国固有的知识进行了积极的互动；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用西方文明对中国所作的科技启蒙，以及中国知识界对此的积极回应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1 阎宗临：《中西交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2 同上。

#### 四、来华耶稣会士促进东学西传和18世纪欧洲中国热

明末以前一千多年的时间，欧洲有关中国的报道大部分以游记为主，且不专记中国，此类记载大多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掺杂了不少夸张和想象的成分。真正对中国研究的萌芽，起源于明末清初早期来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其特点是空间上从漫无边际的东方集中到中国一地；内容上从元蒙时期近于神话传说的传奇描述转向真实直接的实地考察。传教士来华后，西方人对中国有了较为长期而固定的观察，几乎完全以中国为描写和叙述对象开始写作。更为重要的是，来华传教士有一半以上在中国居留超过了20年，足迹遍及内地诸省份；大部分精通中文，能阅读中文书籍，因此对中国的观察不仅局限于外表，而且能逐渐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传教士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全面而系统地探索中国，对中国的研究由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等一般性概况，逐渐发展成对中国经典、宗教、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的研究；更有价值的是，传教士将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成欧洲语言，西方人自此可以通过比较完整的一手资料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经由传教士这个桥梁，西方人终于有机会开始接触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

当时，欧洲人坐在摆着中国瓷器的桌子前，喝着从广东运来的红茶，



读着传教士发自遥远东方的书信与中国故事。18世纪的欧洲，每个人都在描摹着中国，解读着中国，王公贵族从中看到的是东方帝王绝对权威的至高皇权，教会人士看到的是一个亟待福音拯救的遥远国度，探险家商人看到的是遍地黄金的富庶天朝，思想家看到的是政治开明、道德高尚的“理想国”，艺术家看到的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中国风。

18世纪欧洲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魁奈等人在传教士著作的影响下，被中国吸引，发现中国人不信教，但依然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繁荣稳定。

因此，渴望改造本国现实的启蒙思想家将中国看成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可资借鉴的对象，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探索分析。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与研究大体遵循了这样的顺序：历史——宗教——哲学——政治。来华传教士最早介绍的是中国历史，当时欧洲把《圣经》奉为人类起源和古代史的发端，当启蒙思想家接触到中国历史后，发现中国历史与《圣经》历史不符，他们借助耶稣会士验证中国史籍中观察天象记录的结果来考察中国历史的真实性。“伏尔泰指明了中国编年史的可靠性，它的古老悠久无法与《圣经》相符；这无异于大声告诉



人们：《圣经》中的编年史绝不是不信教民族的历史，他们的历史久远得多。”<sup>1</sup>除了中国历史，启蒙思想家最早接触到中国哲学中的儒家思想，也是耶稣会士所介绍的。他们阅读了传教士翻译的儒家经典，将孔子尊为伟大的圣贤，推崇中国以德治国的思想；从自然神论角度把儒家思想解释为一种宗教，但又与基督教进行了区分，认为儒家思想是一套伦理道德标准，贯穿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和整个中国社会，

然而，在1500到1800的这三百年间，正是全球化初始的开端，中国与西方对彼此都产生了兴趣，第一次在一个较为平等、宽容的状态下展开对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对方。

重农学派的魁奈甚至认为“中国人对伦理与政治不加区分，修身与治国之道实为一体”。<sup>2</sup>中国的科举制、官员监督制度等政治体制也为伏尔泰、魁奈等人所称道。总的来说，在耶稣会士和启蒙思想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成为启蒙时代的欧洲反思自我和内部革新的一股强大外力，成为重新诠释与解构欧洲文化的他者，正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先生所言“发现和认识中国，对于18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哲学，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sup>3</sup>

## 五、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意义

美国汉学家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在其著作《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中说，1800年以

后，中国逐步沦为一个不能与西方现代文明平等对话的没落帝国；然而，在1500到1800的这三百年间，正是全球化初始的开端，中国与西方对彼此都产生了兴趣，第一次在一个较为平等、宽容的状态下展开对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对方。当然，当异质文明相遇时不仅有相互的吸引，也必然会产生相互的排斥，而且异质的程度越高，交锋与碰撞就会越激烈；在中西方这次“伟大的相遇”中，中西双方开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交流中展开对话，在对话中反思自我。

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讲话中指出，从历史上中国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可以看出，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需要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来加以充实。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具有特殊身份的人——耶稣会士完成的。他们最重要的历史作用，是为16—18世纪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传递了信息，为东西方的全面交流构筑了渠道，无论是对中国还是欧洲，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对中国而言，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新知，与传统的中国学问迥然不同，

1 Virgile Pinot, *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 1921, Paris, p. 430.

2 转引自许明龙：《东传西渐——中西文化交流史散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59页。参见《中国：欧洲的楷模》（Lewis A.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1946年，第189页。

3 【法】谢和耐：《关于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接触》，载《亚洲学报》，1972年，第79页。



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使得中西学术和思想有了首次全面的相遇与碰撞，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自己，进而正确认识世界，融入近代社会的机会。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固有的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巨大压力和反弹，使得这次近代最大规模的文化碰撞未能对中国的社会产生真正深刻而实质性的冲击。

对欧洲而言，传教士翻经译典，著书立说，中国成为传教士研究和写作的主题，客观上促成了近代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传教士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中国，关于中国的著作不断在欧洲出版，从而在欧洲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

称颂中国文化，从中汲取东方的智慧，并根据时代所需，将中国的思想文化经过加工和改造，为欧洲的反封建斗争增添了思想武器，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提供了可供模仿的范式。借助中国，借助孔子，启蒙思想家吹响了摧毁中世纪思想的号角。

从17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来看，不同文化交流的发生及其结果和影响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蕴含着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有待我们去揭示和总结。明清之际东西方文化的互动是同欧洲近代大航海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西两大文明的全面碰撞必然带来相互的对话与交流。在16世纪到18世纪末的中西文明之间，来华传教士起到了沟通作用，在文化交流当

中担任了重要的媒介角色。这种作用对于当今的世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仍深具启示作用。中国现已成为世界性大国，不仅在全球有着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同时也有着自身的文化利益和价值诉求。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大瓶颈是对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与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政策还没有进行全面的整理、调查与分析，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传播和影响的历史演变，不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情况，就无法真正制定出长远的国家战略。古人说得好：“温故而知新”。从本文所论述的明清来华耶稣会士对中西文化交流之作用可以看出，历史是连接各国人民、各个民族之间的纽带，了解并厘清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途径和人物，运用好历史资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才能更好地展开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各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全球化的视角来全面、辩证地考察中国文化在西方主要国家的传播历史和发展轨迹，揭示出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无、互鉴融会的交流过程，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为当下的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和参考。



## 明朝土鲁番朝贡使臣职官封授考述<sup>1</sup>

姚 胜 /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史馆

### 摘要

明朝对土鲁番的朝贡有着比较规范的管理，主要集中在贡使的职官封授和归化人的给赐两个方面，其中对职官等级以及封授政策有着相对明确的规定，对于归化人的给赐也按职官等级进行了安排。本文通过文献整理与材料分析，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述，以有助于增强对明代土鲁番的认识。

### 关键词

土鲁番 朝贡使臣 封授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明代吐鲁番朝贡使臣职官封授研究”的研究成果。

明朝对西域土鲁番的记载，集中在15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期的一百年间。这一时期，土鲁番逐渐摆脱外部势力控制，并开始向外扩张。哈密就是其往东的主要目标。土鲁番与明朝关系也因哈密问题而变得异常紧张，甚至多次兵戎相见。然而，土鲁番对明朝的朝贡又仍很频繁。土鲁番向明朝朝贡主要是为了谋求经济上的利益，这自不待言。即便其反复攻取哈密，甚至进犯甘肃，“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其商贸利益的需要……控制这条商贸交通的‘金路’”。<sup>1</sup>反过来，明朝虽然对土鲁番叛服不定的行为十分恼火，但基本没有断绝土鲁番的朝贡，而是对其进行了比较规范的管理。此前陶勇先生曾通过对《高昌馆课》的记载进行分析，展现了整个西域对明朝朝贡的面貌，<sup>2</sup>田澍先生也曾以河西走廊为观察背景，对明代整个西域的贡使朝贡情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sup>3</sup>，不过单独考察明朝如何管理土鲁番的朝贡，尤其是明朝前期对土鲁番贡使的管理，对于进一步了解明代西域朝贡的全貌，也还是有着管中窥豹的意义的。

**与明朝在哈密卫的做法不同，明朝对土鲁番朝贡使臣的职官封授实质仅为一种“精神鼓励”，不仅没有直接管辖，甚至连“羁縻”手段似乎都谈不上。我们可以从《明实录》的两条记载中了解到明朝对土鲁番封授官职的等级。**

### 一、使臣职官封授的分等

与明朝在哈密卫的做法不同，明朝对土鲁番朝贡使臣的职官封授实质仅为一种“精神鼓励”，不仅没有直接管辖，甚至连“羁縻”手段似乎都谈不上。我们可以从《明实录》的两条记载中了解到明朝对土鲁番封授官职的等级。

天顺三年（1459）二月二十三日，“哈密、土鲁番、亦力把里、黑晏、哈失哈儿、吉兰、兀鲁木思、戎等处正副使及从人二十六名来朝贡。兵部具升例以闻，上命正副使原有官者升一级，无官者正使授百户，副使授所镇抚，

哈失哈儿等处使臣俱授所镇抚，皆给赐冠带，从人赏赐如例。”<sup>4</sup>

天顺四年（1460）正月二十四日，“升土鲁番等处使臣都指挥同知木撒法儿为都指挥使，指挥使伯兰火只为都指挥佥事，指挥佥事虎秃不丁为指挥同知，正千户撒的为指挥佥事，副千户哈只马黑麻、马黑木、困麻蛮俱为正千户，百户阿力等三人为副千户，迷儿马哈麻等十四人俱授所镇抚。”<sup>5</sup>

从上述记载来看，明朝所授官职，从低到高分别有：所镇抚、百户、副千户、正千户、指挥佥事、指挥同知、指挥使、都指挥佥事、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使。其中，所镇抚为最低等级官职。而都指挥使之上，还有“都督佥事、都督同知、都督”三级。“都督佥事”和“都督”都有明确人员记载，“都督同知”尚未发现相关记载。根据文献记载，明朝所授土鲁番贡使职官（都督同知除外）依次列举如下：

#### 1. 都督

速哥（锁格），其记载有二：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三月二十二日，速哥向明朝贡马。<sup>6</sup>

宣德二年（1427）五月初十，其子也苦着儿升职，《明实录》明确记载

1 田卫疆：《明代吐鲁番地区的社会经济与宗教文化》，载《西域研究》2004年第4期。

2 陶勇：《从〈高昌馆课〉看西域与中原的经济交往》，载《新疆地方志》2006年第3期。

3 田澍：《明代河西走廊境内的西域贡使》，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

4 《英宗实录》卷300，丙子条，第7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美国国会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本微卷影印本第6376页。本文所引《明实录》均为该本。

5 《英宗实录》卷311，壬寅条，第6534页。

6 《太宗实录》卷269，戊戌条，第2440页。



也苦着儿的父亲叫速哥，曾于永乐中来朝。<sup>1</sup>

文献另有两处“锁格”的记录，均非直接记载，主要是在记载其子也苦着儿及其弟猛哥帖木儿的身份时提到了锁格。

宣德元年（1426）九月初七，“土鲁番城故都督锁格子也苦着儿……等来朝贡马驼等物。”<sup>2</sup>

宣德三年（1428）十二月十七日，

“土鲁番城都督锁格弟猛哥帖木儿来朝贡马，命为指挥僉事。”<sup>3</sup>

显然，速哥就是锁格。然而，宣德二年（1427）五月的记载称速哥“永乐中来朝，升都督僉事卒。”与其他三处有关速哥职官的记载有误。查《明实录》有关“都督”与“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混用的记载不止一处，不止土鲁番，对于哈密及其他关西诸卫也都有混乱的记载。鉴于其他三处均称

其为都督，笔者认为其职当以都督为是。速哥至晚于宣德元年（1426）九月前去世，距其入贡不超过两年。

## 2. 都督僉事

尹吉儿察，汉文文献中有四次朝贡记录。

永乐二十年（1422）十二月初一，“土鲁番都督尹吉儿察贡马千三百匹。”<sup>4</sup>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三月二十二日，“土鲁番都督……尹吉儿察等进马。”<sup>5</sup>

洪熙元年（1425）七月初九，“土鲁番城都督僉事尹吉儿察……来朝贡马。”<sup>6</sup>

宣德元年（1426）九月十二日，“土鲁番城都督僉事尹吉儿察……等来朝贡马及方物。”<sup>7</sup>

尹吉儿察于宣德元年最后一次入贡之后留居明朝境内。十月二十四日，行在礼部上奏：“土鲁番城都督僉事尹吉儿察等今还甘肃居住，凡其日用之物请旨量给”。宣宗答复说：“远人朝贡，皆是向慕中国，若待之失宜，岂不失望？况此人已受重爵，宜令缘途有司优与饮食，陕西行都司拨与居宅，毋令失所。”<sup>8</sup>

1 《宣宗实录》卷28，丁酉条，第729页。

2 《宣宗实录》卷21，丁酉条，第551页。

3 《宣宗实录》卷49，甲午条，第1185、1186页。

4 《太宗实录》卷254，戊子条，第2359页。

5 《太宗实录》卷269，戊戌条，第2440页。

6 《宣宗实录》卷4，辛卯条，第111页。

7 《宣宗实录》卷21，壬寅条，第555页。

8 《宣宗实录》卷22，甲申条，第558页。

宣德五年（1430）七月十九日，尹吉儿察率家属进京要求留居北京，“上嘉其诚，从之。赐金织文绮袭衣，命行在工部与居第、什器等物，户部给俸禄。”<sup>1</sup>同年十一月初六，宣宗“命行在户部，尹吉儿察月俸视山后人例，于北京米钞各半支給。”<sup>2</sup>尹吉儿察至晚于宣德九年冬十月前去世。该月二十二日，尹吉儿察子卜烟川儿来归，明朝称其为“已故都督佷事尹吉儿察之子”<sup>3</sup>

尹吉儿察有二子，一名满哥帖木儿，一名卜烟川儿，另有一侄撒都。三者均曾赴明朝贡。

宣德三年（1428）七月二十三日，“土鲁番城都督佷事尹吉儿察子满哥帖木儿……贡马。”<sup>4</sup>

宣德五年（1430）六月十七日，“土鲁番城都督尹吉儿察侄撒都等，来朝贡马。”<sup>5</sup>

宣德九年（1434）十月二十二日，“土鲁番城舍人卜烟川儿等率妻子来归，奏愿居京自效。”<sup>6</sup>

明实录对尹吉儿察官职称谓的出入较大。《太宗实录》卷254、《宣宗实录》卷67称“都督”，《宣宗实录》卷4、



卷5、卷21、卷22、卷45、卷72、卷113则称“都督佷事”。《宣宗实录》卷68共两次记载尹吉儿察为“土鲁番都督”。《太宗实录》卷269有“土鲁番都督速哥尹吉儿察等进马”，而《宣宗实录》卷68在称其为“都督”之后又有“都督佷事”的记载。《太宗实录》卷269的“速哥尹吉儿察”当为“速哥、尹吉儿察”，速哥已如前所述为“土鲁番都督”，如此则似乎可以理解为“尹吉儿察与速哥并为都督”。称尹吉儿察为“都督佷事”的记载要远远多于称为“都督”的记载。另外，从二人各自之子袭职的差别，我们也可以看出，尹吉儿察的地位应当要低于速哥。

宣德二年（1427）五月初十，“升

指挥佷事也苦着儿为都指挥佷事。也苦着儿，土鲁番城人，父速哥永乐中来朝，升都督佷事卒。也苦着儿告袭职初，命袭指挥佷事至是升之。”<sup>7</sup>

宣德九年（1434）冬十月二十二日，“土鲁番城舍人卜烟川儿等率妻子来归，奏愿居京自效，命卜烟川儿为正千户，赐冠带、金织袭衣、彩币、钞、绢布、花有差，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物。卜烟川儿者，已故都督佷事尹吉儿察之子。初尹吉儿察居土鲁番城，为歪思王所逐归附来京，太宗皇帝授都督佷事，后以病卒。至是，卜烟川儿来归且告袭职，故有是命。”<sup>8</sup>

都督速哥子也苦着儿袭职为指挥佷事，而尹吉儿察子卜烟川儿袭职则低一等，为正千户。由此可见，尹吉儿察不是“都督”而是“都督佷事”。

### 3. 都指挥使

木撒法儿，于天顺四年（1460）正月二十四日，由都指挥同知升都指挥使。<sup>9</sup>

### 4. 都指挥同知

兀思塔阿里（故都指挥同知），天顺七年（1463）八月十二日，其侄撒因阿力火只袭职，所袭职级未见记载，

1 《宣宗实录》卷68，丁巳条，第1600页。

2 《宣宗实录》卷72，癸卯条，第1679页。

3 《宣宗实录》卷113，乙丑条，第2557页。

4 《宣宗实录》卷45，癸酉条，第1110页。

5 《宣宗实录》卷67，丙戌条，第1582页。

6 《宣宗实录》卷113，乙丑条，第2557页。

7 《宣宗实录》卷28，丁酉条，第729页。

8 《宣宗实录》卷113，乙丑条，第2557页。

9 《英宗实录》卷311，壬寅条，第6534页。

据速哥、尹吉儿察之子袭职例，其侄当不高于都指挥僉事。<sup>1</sup>

#### 5. 都指挥僉事

也苦着儿（爱鬼着儿），宣德二年（1427）五月初十，“升指挥僉事也苦着儿为都指挥僉事。”<sup>2</sup>宣德元年（1426）九月初七，也苦着儿“来朝贡马驼等物。”此前，其父都督速哥去世，也苦着儿袭职为指挥僉事。<sup>3</sup>宣德四年（1429）五月二十五日，也苦着儿以都指挥僉事身份向明朝贡马。<sup>4</sup>宣德四年九月初八，都指挥僉事爱鬼着儿来朝留京。<sup>5</sup>宣德五年（1430）六月二十八日，其所部舍人哈因虎里等皆奏愿居京自效。<sup>6</sup>也苦着儿从指挥僉事升为都指挥僉事为连升三级。

伯兰火只，于天顺四年（1460）正月二十四日，由指挥使升为都指挥僉事。<sup>7</sup>

舍黑马哈麻（故都指挥僉事），其子迭儿必失于天顺四年（1460）正月二十四日，升指挥使。<sup>8</sup>

失黑马哈麻（故都指挥僉事），其子沙儿火只等于天顺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袭职。<sup>9</sup>

法黑儿者罕（故都指挥僉事），其侄秃买秃马哈麻赤儿米即于天顺七年（1463）八月十二日袭职。<sup>10</sup>

鬼力赤，于天顺七年（1463）八月十二日，由指挥使升一级为都指挥僉事。<sup>11</sup>

#### 6. 指挥使

迭儿必失，故都指挥僉事舍黑马哈麻子，于天顺四年（1460）正月二十四日，升指挥使，原职不详。<sup>12</sup>

米郎，于天顺六年（1462）六月初三，受命为指挥使，原职不详。<sup>13</sup>

#### 7. 指挥同知

虎秃不丁，于天顺四年（1460）正月二十四日，由指挥僉事升为指挥同知。<sup>14</sup>

马黑麻迭力迷失，于天顺六年（1462）六月初三，由指挥僉事升为指挥同知。<sup>15</sup>

阿马力沙力免力，于天顺七年（1463）八月十二日，由指挥僉事俱升一级为指挥同知。<sup>16</sup>

#### 8. 指挥僉事

他力麻敏何秃，于宣德三年（1428）三月初六来朝留京，由千户升为指挥僉事。<sup>17</sup>

猛哥帖木儿，土鲁番故都督速哥弟，于宣德三年（1428）十二月十七日受命为指挥僉事。<sup>18</sup>

撒的，于天顺四年（1460）正月二十四日，由正千户升为指挥僉事。<sup>19</sup>

1 《英宗实录》卷 356，戊戌条，第 7108 页。

2 《宣宗实录》卷 28，丁酉条，第 729 页。

3 《宣宗实录》卷 21，丁酉条，第 551 页。

4 《宣宗实录》卷 54，庚午条，第 1301 页。

5 《宣宗实录》卷 58，辛亥条，第 1377 页。此处“都指挥僉事爱鬼着儿”，与“都指挥僉事也苦着儿”当系同一人。

6 《宣宗实录》卷 67，丁酉条，第 1589 页。

7 《英宗实录》卷 311，壬寅条，第 6534 页。

8 同上。

9 同上。

10 《英宗实录》卷 356，戊戌条，第 7108 页。

11 同上。

12 《英宗实录》卷 311，壬寅条，第 6534 页。

13 《英宗实录》卷 341，丙寅条，第 6917 页。

14 《英宗实录》卷 311，壬寅条，第 6534 页。

15 《英宗实录》卷 341，丙寅条，第 6917 页。

16 《英宗实录》卷 356，戊戌条，第 7108 页。

17 《宣宗实录》卷 40，戊戌条，第 979 页。

18 《宣宗实录》卷 49，甲午条，第 1185、1186 页。

19 《英宗实录》卷 311，壬寅条，第 6534 页。

奴儿丁（故指挥僉事），其弟马麻答力于天顺七年（1463）八月十二日袭职。<sup>1</sup>

满刺亦麻的（故指挥僉事），其子陕西丁于天顺七年（1463）八月十二日袭职。<sup>2</sup>

#### 9. 正千户

李罗帖木儿，于正统九年（1444）二月入贡，受命为正千户。

哈只马黑麻、马黑木、困麻蛮，于天顺四年（1460）正月入贡二十四日，俱由副千户升为正千户。<sup>3</sup>

#### 10. 副千户

阿力等三人，于天顺四年（1460）正月入贡二十四日，由百户升为副千户。<sup>4</sup>

满刺马哈麻，于天顺七年（1463）正月二十一日入贡，由百户升为副千户。<sup>5</sup>

#### 11. 百户

亦不刺忻，于天顺七年（1463）正月二十一日入贡，由所镇抚升为百户。<sup>6</sup>

#### 12. 所镇抚

哈因虎里，为都指挥僉事爱鬼着

儿所部舍人，于宣德五年（1430）六月初八奏请留京，受命为所镇抚。<sup>7</sup>

马黑麻，于正统十三年（1448）六月十九日入贡，受命为所镇抚。<sup>8</sup>

迷儿马哈麻等十四人，于天顺四年（1460）正月二十四日入贡，受命为所镇抚。<sup>9</sup>

法虎儿丁等五人，于天顺七年（1460）正月二十一日入贡，受命为所镇抚。<sup>10</sup>

那速儿丁等十七人，于天顺七年（1460）八月十二日入贡，受命为所镇抚。<sup>11</sup>

#### 13. 僧官

除俗官之外，明朝还对土鲁番进贡僧人封授僧官，主要为“国师”与“僧纲司都纲（简称都纲）”。

清来，永乐六年（1408）五月十三日，率其徒法泉入明朝贡，受封为灌顶慈慧圆智普应国师。<sup>12</sup>

把刺马刺失里，宣德四年（1429）八月二十六日入明朝贡，在此之前应当已受封为国师。<sup>13</sup>

法泉，永乐六年（1408）五月十三日，随清来入明朝贡，受封为土

鲁番等城僧纲司官。<sup>14</sup>

桑果，宣德四年（1429）五月十四日入明朝贡，受封为土鲁番城僧纲司都纲。<sup>15</sup>

佛先，宣德五年（1430）五月初三入明朝贡，受封嗣其父法先之职为都纲。<sup>16</sup>

法先，只见载于《宣宗实录》卷66，其曾受封为僧纲司都纲，其子佛先继承了他的都纲一职。此处法先和佛先两位僧人之间的“父子”关系另人生疑，怀疑为二者“师父与弟子”的关系，同时，笔者怀疑法先即法泉。小田寿典在提及法泉时，在其后标注了“（法先）”，看来也是认为二者为同一人。<sup>17</sup>

## 二、使臣职官封授政策

明朝中期以前，职官封授有比较成体系的制度，其后期由于同土鲁番的军事斗争日趋尖锐，职官封授自正统后即不见于史籍。对于新出现的情况，明朝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封授政策上的调整。对此，我们大约可以概括出以下三条规定：

1 《英宗实录》卷356，戊戌条，第7108页。

2 同上。

3 《英宗实录》卷311，壬寅条，第6534页。

4 同上。

5 《英宗实录》卷348，辛亥条，第7010页。

6 同上。

7 《宣宗实录》卷67，丁酉条，第1589页。

8 《英宗实录》卷167，癸酉条，第3232页。

9 《英宗实录》卷311，壬寅条，第6534页。

10 《英宗实录》卷348，辛亥条，第7010页。

11 《英宗实录》卷356，戊戌条，第7108页。

12 《太宗实录》卷79，辛酉条，第1062页。

13 《宣宗实录》卷57，庚子条，第1369页。

14 《太宗实录》卷79，辛酉条，第1062页。

15 《宣宗实录》卷54，己未条，第1301页。

16 《宣宗实录》卷66，壬寅条，第1551页。

17 In 1408, when a priest named Ch'ing-lai 清來 and his disciples, Fa-ch'üan 法泉 (Fa-hsien 法先) etc., came with their tributes, the Ming court conferred the title of kuo-shih on Ch'ing-lai, and gave the ranks of tu-kang 都綱 (the chief officiant) etc. Oda Juten (小田寿典), *Uighuristan, Acta Asiatica*, No.34, 1978 p.40.

### 1. “荫子袭职”。

从前述列举的职官封授统计来看，明朝对土鲁番的职官封授，存在着大量的子袭父职、侄袭伯职的情况。不过，一般来说，如果父辈是高品级的官职，子、侄一般是先封授低品级的官职，之后有机会再行升迁；如果父亲是低品级的，也有直接子袭父职的情况。

不过明朝对于“子袭父职”也比较谨慎。除了对哈密明朝一般比较易于允准之外，包括土鲁番在内的其他部族一般都得一事一报。《明会典》有这么一条记录：“凡哈密等处使臣求袭父职者，查有原降诰勅，照例袭替换给，其余外夷乞讨官封，俱临时奏请定夺。”<sup>1</sup>

2. 原授官职承袭须有凭借，基本停止新授官职。

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十四日，“土鲁番兀也思王为其使臣火者马哈麻等十三人奏乞职事。兵部言：各夷原无授职敕书，又无捷报劳绩，但今甘肃方有警请于常格赏赐外，少加彩币以慰其意。从之。”<sup>2</sup>

从兀也思王为其使臣“奏乞职事”未获允准一事来看，明朝对于土鲁番使臣的职官封授是比较谨慎的，有着比较严格的“遵循先例，敕书为凭”的做法。近半个世纪之后，嘉靖十五



年（1536）十二月二十六日，兵部以“制御套虏，抚处瓦剌，诛迁夷使”三事下总督重臣议，“奏属番应授官职者许替袭如例，原无官职者不得滥与……诏如议行”。<sup>3</sup>由此重申了封授官职的成例，并明确了职官封授的原则，尤其是对来朝贡使不得滥授官职。当然，应该也有例外，即如前述成化二十三年（1487）兵部所言，受赐人员需要有军功捷报。

最后一次见诸史籍的职官封授发生在天顺七年（1463）八月，此后明朝未再对土鲁番贡使进行系统地封授官职。我们也可以想像，兀也思王的

奏乞发生在最后一次封授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明朝未予同意，亦属常情。

3. 对于贡使冒滥称“王”进行制约。

土鲁番自速檀满速儿死后，国势衰微，无力组织正规的朝贡使团，入贡者多冒滥称王。“时西夷入贡，土鲁番、天方国等称王者百余人”。

嘉靖十二年（1533）五月初四，“礼部尚书夏言、兵部尚书王宪等议……请查照成化、弘治间例，回赐敕书止本国王一人，余止照各地面名，直书给敕一道，且于本国王敕内申重天语，少加诰责，令知国无二王大义，仍定以贡期，限以人数，不许其来朝。”<sup>4</sup>

嘉靖十六年（1537）正月二十二日，礼部覆甘肃巡抚赵载所议：“西域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各国称王者百五十余，皆非本朝封爵，又额即乱哈辛原非入贡番夷，盖西域贾胡诡立名色以徼赉予，今宜译审酋长体例，使臣名数，及查四夷一切事宜，定为限制，冒滥称王者，责令改正，违例入贡者以礼阻回。”<sup>5</sup>

西域各国入贡称王者泛滥，显然是为了适应中原王朝的政治习惯，称“速檀”等当地名号，显然不如称王来得方便，并且能够更为丰厚的朝贡回

1 《明会典》卷121，“土夷袭替”条，万历重修本第13、14页，《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2 《孝宗实录》卷7，甲子条，第153页。

3 《世宗实录》卷194，丁未条，第4112页。

4 《世宗实录》卷150，丙午条，第3433、3434页。

5 《世宗实录》卷196，壬寅条，第4148页。

赐。明朝对称王者泛滥的情况颇为不满，一方面是处于四夷宾服，君臣应当有序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不堪回赐重负。明朝以“国无二主”这一中国传统政治观念来约束西域贡使，既表明了明朝对西域政治现实的茫然无知，也进一步反映了明朝对西域不思进取、穷于应付的政治保守。

### 三、土鲁番贡使归化的管理

明朝关于土鲁番人员归化的记载，明确的有 17 处，其中宣宗朝 13 名，英宗正统朝两名，景泰帝和世宗时期各有一名。其中宣德时期归附的都督遣使尹吉儿察归附之后先是在肃州居住，而后赴京居住。回回僧海失都自请留居甘州。英宗、景泰帝时期归附的所镇抚撒法儿与回回察乞儿被安排在南京居住。世宗时期归附的牙木兰被安排在湖广居住。牙木兰本土鲁番速檀满速儿的悍将，因与满速儿有隙，逃归明朝，在牙木兰归附动机不易明查的情况，安排牙木兰居住湖广，显然是防止其成为满速儿侵扰明朝的内应。其他 12 名归附人员，明朝均安排在北京居住，并多有赏赐。

赏赐除必须的居宅房屋之外，另有货币、口粮、日用品、服装、家具、交通工具等。货币有：银、钞；口粮有：米、牛、羊等；日用品有：器皿、彩币、

花；服装有：金织文绮袭衣、金织袭衣、紵丝袭衣、绢布、纱绵布、靴、袜等；家具有：床榻；交通工具有：鞍马。

宣德年间归附者，多有封授官职，且大多为升职，给予冠带。高级官职如都督僉事尹吉儿察除衣食住行之外，还有俸禄。英宗、景泰帝期间归附者被安排于南京居住，并进入南京锦衣卫，另一随都纲佛先归附的舍人南忽力，佛先安排在北京寺庙，南忽力则进入锦衣卫。

#### 1. 都督僉事尹吉儿察

关于尹吉儿察入居明朝的问题，田卫疆先生在《吐鲁番史》(2004)、《关于明代吐鲁番史若干问题的探讨》(2006)以及施新荣先生在《哈密卫研究中》已有所论及。关于尹吉儿察入居明朝的主要材料备列如下：

初，“尹吉儿察居土鲁番城，为歪思王所逐归附来京”<sup>1</sup>。

宣德元年(1426)十月二十四日，行在礼部奏：“土鲁番城都督僉事尹吉儿察等今还甘肃居住，凡其日用之物请旨量给。上曰：‘宜令缘途有司优与饮食，陕西行都司拨与居宅，毋令失所。’”<sup>2</sup>

行在礼部奏称尹吉儿察留居甘肃的日期是，宣德元年(1426)十月二十四日。在此之前，尹吉儿察于该年九月十二日，“来朝贡马及方物，”<sup>3</sup>

并于十月初二，获赐“银、钞、彩币表里、纱罗、绫绢、文绮、袭衣”等物。行在礼部奏报之日为尹吉儿察受赐之日之后的二十二天。尹吉儿察归国，当在十月初二之后，亦即在归国途中，尹吉儿察获悉土鲁番为歪思王所占，于是上报明朝请还于甘肃居住而非出关返回土鲁番。行在礼部奏言其事之后，宣德皇帝认为“宜令缘途有司优与饮食”，加之当时尹吉儿察离开尚不足月，可以想见：其时尹吉儿察仍在途中，还未抵达甘肃，更未达到土鲁番。

关于尹吉儿察使团归国的速度，我们可以参考同时期的帖木儿帝国遣往明朝的盖耶速丁使团。《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记载的盖耶速丁使团，于 1420 年(永乐十八年)10 月 22 日到达兰州，大约 50 天之后，12 月 14 日到达北京。其中，11 月 18 日到达河南一带的黄河渡口，之后 26 天左右抵达北京。返程路线稍有不同，但也是大约 50 天之后从北京到达兰州。<sup>4</sup>

因此，可以判断，尹吉儿察归国途中，尚在北直隶与河南交界一带，闻知土鲁番事变，上报行在礼部愿“还甘肃居住”。

《明实录》记载尹吉儿察曾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三月入贡，之后于洪熙元年(1425)七月再次入贡，之

1 《宣宗实录》卷 113，乙丑条，第 2557 页。

2 《宣宗实录》卷 22，甲申条，第 558 页。在田文、施文所引文字中“尹吉儿察等今还甘肃居住”的“今”作“令”。

3 《宣宗实录》卷 21，壬寅条，第 555 页。

4 何高济译：《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间往返间隔十四个月。之后又一次入贡的时间为宣德元年（1426）九月，与前次之间往返间隔又是十四个月。

实录所言尹吉儿察为歪思王所逐归附来京，应当有个过程。被逐之后，尹吉儿察先留居甘肃，五年之后才率家属归附至京。

宣德五年（1430）七月十九日，“土鲁番城头目都督佉事尹吉儿察奏臣率家属来朝，愿居京师以图报效，上嘉其诚，从之。赐金织文绮裘衣，命行在工部与居第、什器等物，户部给俸禄。”<sup>1</sup>

宣德五年（1430）十一月初六，“命行在户部，土鲁番城来归都督佉事尹吉儿察月俸视山后人例，于北京米钞各半支給。”<sup>2</sup>

### 2. 千户他力麻敏何秃

宣德三年（1428）三月初六，“土鲁番城千户他力麻敏何秃等来朝……奏愿居京自效，命为指挥佉事、所镇抚等官，赐冠带、金织裘衣、彩币、银、钞、绢布、鞍马有差，仍命有司给与房屋、器皿、牛羊等物如例。”<sup>3</sup>

3. 都指挥佉事爱鬼着儿（也苦着儿）

**《明实录》记载尹吉儿察曾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三月入贡，之后于洪熙元年（1425）七月再次入贡，之间往返间隔十四个月。之后又一次入贡的时间为宣德元年（1426）九月，与前次之间往返间隔又是十四个月。**

宣德四年（1429）九月初八，“土鲁番城都指挥佉事爱鬼着儿等来朝，奏愿居京自效，赐金织裘衣、彩币、银、纱绵布、鞍马，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皿等物如例。”<sup>4</sup>

### 4. 哈因虎里

宣德五年（1430）六月初八，“土鲁番城都指挥佉事爱鬼着儿所部舍人哈因虎里等……皆奏愿居京自效，命为所镇抚，赐冠带、金织裘衣、彩币、银、钞、鞍马，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皿等物如例。”<sup>5</sup>

### 5. 撒都

宣德五年（1430）九月十二日，“土鲁番城回撒都等……来朝皆奏愿居京自效，命撒都……为百户，各赐冠带、金职裘衣、彩币、银、钞、鞍马，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皿等物如例。”<sup>6</sup>

此前有土鲁番城都督尹吉儿察侄撒都入贡。宣德五年（1430）六月十七日，“土鲁番城都督尹吉儿察侄撒都等来朝贡马。”<sup>7</sup>七月初七，“赐……土鲁番城都督尹吉儿察侄撒都等彩币表里、绢布裘衣有差。”<sup>8</sup>笔者怀疑两个撒都为同一人。

### 6. 万户阿黑把失

宣德五年（1430）十二月二十一日，“柳城万户阿黑把失等十六人来朝，奏愿居京自效，命阿黑把失等五人为副千户等官，赐金织裘衣、彩币、钞布有差，仍总命有司给房屋、器皿等物如例。”<sup>9</sup>

### 7. 指挥佉事猛哥帖木儿

宣德五年（1430）十二月二十二日，“土鲁番城指挥佉事猛哥帖木儿等三十八人来朝，奏愿居京自效，赐金职裘衣、彩币、钞、绢、绵布，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皿等物如例。”<sup>10</sup>指挥

1 《宣宗实录》卷 68，丁巳条，第 1600 页。

2 《宣宗实录》卷 72，癸卯条，第 1679 页。

3 《宣宗实录》卷 40，戊戌条，第 979 页。

4 《宣宗实录》卷 58，辛亥条，第 1377 页。

5 《宣宗实录》卷 67，丁酉条，第 1589 页。

6 《宣宗实录》卷 70，庚戌条，第 1644 页。

7 《宣宗实录》卷 67，丙戌条，第 1582 页。

8 《宣宗实录》卷 68，乙巳条，第 1592 页。

9 《宣宗实录》卷 76，癸卯条，第 1764 页。

10 《宣宗实录》卷 76，癸卯条，第 1764 页。

金事猛哥帖木儿是土鲁番都督速哥(锁格)之弟。

#### 8. 胡马儿舍

宣德六年(1431)二月初八,“土鲁番城胡马儿舍等来归,皆奏愿居京自效,命为指挥金事百户等官,赐冠带、金织袈衣、彩币、银、钞、鞍马有差,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物如例。”<sup>1</sup>

#### 9. 陈檀

宣德七年(1432)八月十七日,“土鲁番城舍人陈檀等来朝,奏愿居京自效。赐紵丝袈衣、彩币、钞、布有差,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物。”<sup>2</sup>

#### 10. 回回僧海失都

宣德八年(1433)正月二十三日,“土鲁番城回回僧海失都来归奏愿居甘州,皆从之,赐紵丝袈衣、钞、布有差,仍命……陕西行都司给房屋、器物如例。”<sup>3</sup>

#### 11. 回回伯颜帖木儿

宣德八年(1433)十月十七日,“土鲁番城回回伯颜帖木儿等来归,奏愿居京自效,赐紵丝袈衣、钞、布,仍令有司给房屋、器物如例。”<sup>4</sup>

#### 12. 卜烟川儿

宣德九年(1434)冬十月二十二



日,“土鲁番城舍人卜烟川儿等率妻子来归,奏愿居京自效,命卜烟川儿为正千户,赐冠带、金织袈衣、彩币、钞、绢布、花有差,仍命有司给房屋、器物。未几升卜烟川儿为指挥金事,而以其部属舍黑马黑麻等五人为试所镇抚。”<sup>5</sup>

#### 13. 都纲佛先、舍人南忽力

正统二年(1437)三月初六,“土鲁番城都纲佛先、舍人南忽力等奏愿居京自效,命佛先等安插在京寺院,日与饷廩,南忽力等隶锦衣卫,给房屋、什器、月粮。”<sup>6</sup>

#### 14. 所镇抚撒法儿

正统十一年(1446)五月十三日,“土鲁番地面回回所镇抚撒法儿来归,上命隶南京锦衣卫,月支食米二石,赐彩币表里、紵丝袈衣、靴、袜等物。”<sup>7</sup>

#### 15. 回回察乞儿

景泰元年(1450)十二月二十日,“土鲁番进贡回回察乞儿……来归,命为头目送南京锦衣卫安插,给赐钞卫、紵丝衣、靴、牛、羊、柴米、房屋、床榻等物。”<sup>8</sup>

#### 16. 牙木兰

嘉靖七年(1528)六月初二,“番夷牙木兰、帖木哥、土巴率众内附。”

嘉靖八年(1529)六月二十八日,“诏湖广巡抚处给安插土鲁番酋牙木兰等房屋、口粮有差。”<sup>9</sup>

《明实录》所记载的归附明朝的土鲁番人一共十七名。可以看到,在宣德五年(1430)当年就有四人归附,宣德五年前后的几年间另有七人归附。宣德年间出现大量土鲁番人士归附这一情况的原因,施新荣先生认为是歪思汗控制土鲁番造成的。<sup>10</sup>对此,笔者持相同看法。

1 《宣宗实录》卷94,癸卯条,第2132页。

2 《宣宗实录》卷98,丁丑条,第2212页。

3 《宣宗实录》卷106,十月丙寅条,第2377页。

4 《宣宗实录》卷113,乙丑条,第2557页。

5 《英宗实录》卷28,丙申条,第557页。

6 《英宗实录》卷141,庚辰条,第2791页。

7 《英宗实录》卷199,庚寅条,第4232页。

8 《世宗实录》卷89,壬寅条,第2007页。

9 《世宗实录》卷102,辛卯条,第2415页。

10 施新荣:《哈密卫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4月,第73页。

#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亚洲权威网络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项目负责人：**梁野（北京外国语大学计算机系）

**立项时间：**2015年5月



## 项目介绍：

### 一、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目前，有关国家形象的调查研究，基本上还是处于调查问卷的形式。虽然我们已处在信息时代，国际形象研究者对信息技术的使用仍然有限，即便偶有涉及，也主要用在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加工、处理等后期数据处理

阶段。而对样本采集方面，使用信息技术则基本仅限于使用网络调查问卷这一种形式。

实际上，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情绪、观点、情感等主观意识，都会通过新闻报道、论坛、博客、微博等媒体渠道，发表于网络之上。而对这些巨量、免费的第一手资料，国际形象研究者却很少使用。究其原因，主

要是由于互联网上的数据过于庞大，远远超出任何一个研究团队的能力，而且数据的产生源源不断，无法构建一个长效的网络情报搜集机制。

### 二、选题意义和价值

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亚洲很多网络媒体都或多或少地刊载了一些与中国相关的负面新闻，这必然影响其受众对中国的认知。而一个网络媒体越具有权威性，其影响的人群就越广泛。这说明网络媒体对一个国家的态度与其受众对该国的认识有着极强的正相关性。因此，可以通过对亚洲权威网络媒体进行实时分析，自动搜集有关中国的相关新闻，进而对未来中国国际形象的波动方向进行预测。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所在国家之外的公众对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自然要素的一种综合认识与评

价。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中的“软实力”，是极其重要的无形资产。本项目将通过互联网这一开放性的平台，广泛搜集分析亚洲权威网络媒体对中国的自然要素、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等各个方面的认识，举证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从而为未来中国不断提升自身国际形象提供第一手资料。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基本思路和方法

#### （一）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选取亚洲权威网络媒体的官方网站作为新闻来源，自动实时采集与中国相关的新闻报道，并分析每一篇报道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影响值，该值越高，则说明该新闻报道对中国的形象越有利。通过长期自动检测，

可以自动汇总生成中国国家形象的变化情况。

#### （二）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

由于互联网信息超载，信息的有效采集、整理和使用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把来自互联网上各个权威网络媒体上的新闻进行快速获取、快速整理、去重去伪，是大数据时代基于媒体新闻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工作急需解决的问题。

#### （三）本课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本课题提出了以网络媒体中的公开新闻报道为研究对象，自动搜集与中国相关的新闻报道，并挖掘其中可能对中国国际形象影响的新闻报道，同时对影响程度进行度量。

本研究将国际形象评价研究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使两者的结合不再仅限于网络调查问卷等低耦合阶段。本课题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无需被调查者主动参与：有可能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影响的新闻报道会被自动采集；

第二，实时不间断调查：新闻采集工作会 7\*24 小时不间断进行，实时跟踪权威媒体的最新报道；

第三，结果主动反馈：自动计算每篇与中国相关的新闻对中国国际形象的影响值，定期汇总后以图表等形式直观展现出来。

#### （四）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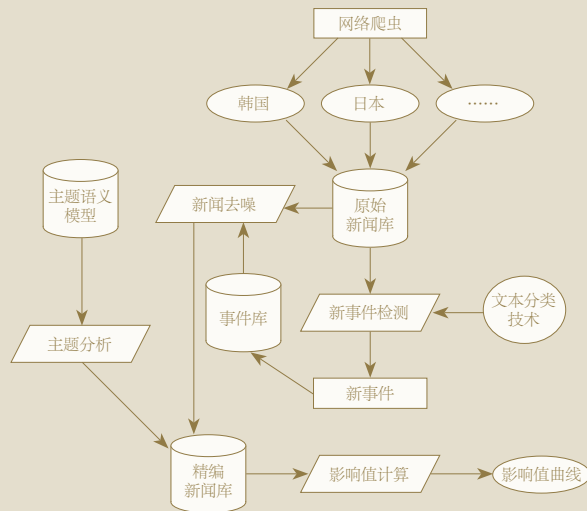
首先，实现高效的网络新闻自动爬取。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各权威网站获取最新的、第一手的新闻资讯，并存储在本地库中，形成原始新闻库。由于新闻文本信息冗余度高，采用文本压缩、去重等技术，提高存储利用率。并采用语义数据库、列存储方式，有效的切分数据空间，提高查询、读取效率。

其次，对原始新闻库中的数据，使用文本分类技术，进行新事件检测，或区分同一话题的不同事件，并把检测到的新事件保存到事件库中。

再次，将处理后的原始新闻库中的数据经过离线去噪，剔除重复、转发新闻，生成精编新闻库。

最后，以精编新闻库中的新闻为依托，进行新闻的影响值计算，并以月为单位绘制变化曲线。

图 1 系统研究架构图



**项目名称：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情况研究（2012—2013）**

**项目负责人：全慧（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

**立项时间：2015年5月**

## 项目介绍：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意义和价值

基于 SSCI 和 A&HCI 数据库进行文献计量研究，在图书情报界已有数年的历史，分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章近年来也屡现报端。然而将此二者结合起来，运用国际知名索引数据库中的数据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还属于创举。

本研究既可以看作是基于权威数据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现状汇报，也可以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国际化的中期检验，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迈得更稳健提供支撑。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基本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将以目前国际通用的客观详实而权威的数据为基础，报告 2012—2013 年度中国学者在国际哲学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情况；从发文数量、合作对象、使用语言、涉及学科等角度，分析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短板；重点在于数据的采集和分类；难点在于对分类数据的分析和评价；



创新之处在于本研究并非仅立足于一两年的片段数据进行分析，而是对该课题保有持续性的观照，如此得出的结论必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通过对所得数据的分析以及与往年数据的比较，笔者认为，2012—2013 年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在国际上的总体学术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体现为发文数量的绝对提升；同时各个领域内的影响也逐渐深入，体现为合作对象的稳步扩大；语言和学科仍然是制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最大制约，要求学者提高自身水平固然重要，国家力量的发展、汉语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本研究数据来源方面所选取的 SSCI 和 A&HCI 在业内具有一定的公

信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以英语为主、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模式限制了他国及他种文化的表达，对于衡量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情况具有不可回避的较为负面的影响。因此在全球性、更多元的索引数据库出现之前，以此作为主要参考乃是不得已之举，希望在将来能有更客观的数据来源。研究者方面，由于仅从期刊数据出发，缺少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情况的全面掌握，因此可能造成研究结论的单一甚至失于偏颇。要想做好此类研究，必须积极推进数据来源的建设，同时提高研究者的全局把握能力。

**项目名称：近代西文汉学期刊中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项目负责人：孙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立项时间：2015年5月**

## 项目介绍：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国内中国古代史学界展开对此前研究的大规模回顾与反思，但专门以欧美学界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为对象的学术史梳理仍远远不够。现有的学术史整理存在两大缺陷，一方面，回顾大多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研究进行讨论，对此前，特别是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间研究的整理则付诸阙如；另一方面，回顾大多局限于明清史方面，对其它时代中国史的研究关注不够。近代以来，侨居于中国的西方人创办了很多西文汉学期刊，包括《中国评论》、《中国丛报》、《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等，其中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奠定了当代西方汉学相关研究的基础。然而，在目前的学术史梳理中，这些内容却基本不为人所知。当前对于这些期刊的整理，大多仍是从海外汉学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概括性的综述，勾勒出期刊的大体面貌，代表性成果如王毅的《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研究》、王国强的《〈中国评论〉与西方汉学》等。这些研究并未能深入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具体领域中，对相关研究在



学术发展脉络中的地位和特点进行细致的讨论，与西方学者就具体的问题展开对话，显然并不符合未来学术发展的规律。

### 二、选题意义和价值

（一）通过对既往学术史的回溯，能够让我们了解西方学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如何延伸，使我们对于当前的学术潮流、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所自觉。

欧美学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生和发展有其内在的脉络和理路，本项

目着眼于考察其从“业余”走向“专业”的过程，并探究西方学术在其政治、文化和知识语境中，如何形塑出有关中国古代史的学术观念和方法，从而为国内学界提供一个参考系，使我们对未来学术的潮流和方向有所自觉。

（二）对欧美学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进行检讨，为国内相关研究开启新的视野。

从域外引进前沿史学理论和办法，对海外学者的视角和思路加以借鉴，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另一方面，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演进模式和学术传统，根据欧洲经验归纳出来的史学理论，不能直接套用于中国研究，不同学术传统间概念和方法的转化和使用，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学术批判和反思。本项目将对西方学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进行辨析，为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提供借鉴。

### 三、主要内容、重点与创新点

本项目将深入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具体领域和具体问题中，对近代西文汉学期刊中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梳理，提炼西方早期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特点与变化，展现这一阶段相关学术研究的共性与个性，

从而勾勒出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创立和发展的脉络，填补学术史中缺失的一环，这是本项目的主要内容，也是本项目的创新点。

#### 四、难点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与学术传统、社会文化大背景、时代背景都有密切关系，因此西方学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提出的议题、使用

的理论、采用的研究范式，都应该深入到那个时代的宏观语境中来加以分析，这是本项目的一大难点。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20世纪初，胡适先生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提出“述学”、“明变”、“求因”、“评判”四个步骤，本课题将沿用这一思路，借鉴这一方法。所谓“述学”，是对期刊反映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的面貌进行考察和阐述；所谓“明变”，是勾勒出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创立和发展的脉络，展现不同阶段学术研究的共性与个性；所谓“求因”，是将学术发展置于宏观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探究推动学术发展的动力；所谓“评判”，是对西方学者的研究展开对话和辩证。

**项目名称：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生态问题研究及其启示**

**项目负责人：孙磊（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立项时间：2015年5月**

#### 项目介绍：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意义和价值

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争论的焦点，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既与重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诉求有关，也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密切关联。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在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生态学思想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探寻生态研究的别样路径，对我国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生态问题的研究即源于此。



国内外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生态思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

（一）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流生态思想进行介绍，认为日本学者具有较为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日】岩佐茂著，韩立新等译）、《地球环境和公共性》（【日】

佐佐木毅著，韩立新、李欣荣译），即对日本学者的“环境”观念的历史性变迁、环境和公共性的关系等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介绍。

（二）在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思想和著作进行研究、译介和阐发过程中，有对日本学者生态思想的介绍，如袁贵仁、杨耕主编的《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本学者卷》，其中不乏对日本学者梯明秀“自然历史过程”、平田清明“循环—积累理论与历史认识”、岛崎隆“再论马克思唯物论的‘Stoffwechsel’（物质代谢、质料变换）概念”等思想的深入阐述。

（三）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生态问题的关注和所秉持的生态意识给予高度评价和认可。英国著名历



史学家汤因比曾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进行对话，池田大作对 21 世纪的生态问题深度关注，为汤因比所赞许。国内学者对池田大作研究较为深入，包括领导层对其生态环境方面的贡献给予较高评价；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对日本学者的生态思想给予了深切关注，认为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

综上所述，目前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生态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尚有一些不足和薄弱之处：如对日本学者生态思想的整体性发展脉络、内容的阐发和研究还有待深入；关于日本学者生态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价值的探寻有待加强。

## 二、选题意义和价值

(一)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日本学者生态思想的研究，比较强调部分学者的生态思想或某些学者的零散论述，缺乏对日本学者生态思想整体性状况的系统把握和研究。本研究基于日本学者的著作文本，力图规避对日本学者生态思想的零散化解读，着重于对其生态思想进行整体性把握。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立场，区别于一般的个案研究，力图比较完整系统地阐释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生态思想的精华，特别是日本学者生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现实意义，从而为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基本思路和方法

### (一) 主要内容

1. 以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生态思想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课题研究对象，以近年来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为理论依托，解读日本学者生态学相关著作，分析其生态学思想的整体脉络和基本内容。

2. 通过比较研究，探寻近年来学界对日本学者生态思想阐发尚待深入及过度解读之处。

3. 探寻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生态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为中国现实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重点难点在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一研究对象的筛选和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纷繁的生态思想如何梳理整合和萃取凝练。

### (二) 主要观点

1. 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具有丰富而较为深刻的生态学思想，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恶化、循环一积累理论、物质变换等诸多方面。

2. 日本学者的生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丰富。

3. 日本学者生态思想与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的区别。

4. 日本学者生态思想是中国解决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有益借鉴。

### (三) 创新之处

1. 以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生态思

想相关著作作为研究对象，把握其生态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整体脉络，客观对待日本学者生态学思想文本，做出综合理论创新。

2. 借鉴和吸收现有科学研究成果，比较日本生态思想与其他生态思潮的异同，探究其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3. 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分析方法看待一系列的理论 and 现实问题。

#### （四）基本思路

本课题致力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

者生态学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启示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出发，立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文本，结合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探寻日本生态思想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

#### （五）研究方法

1. 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日本生态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历史境遇，探寻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困境。

2. 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日本学者经典文本为研究基础，把握其对于生态问题的整体思考，结合全球化的生态现实，探寻日本生态学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代价值和启示。

3. 系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对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对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相关的思潮进行反思。

**项目名称：16—19 世纪儒学典籍西译研究：以来华传教士对《大学》的译介为中心**

**项目负责人：罗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立项时间：2015 年 5 月**

## 项目介绍：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意义和价值

#### （一）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明清来华传教士是“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最早践行者，其主体包括明末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以及清后期入华的新教传教士。随着近年来传教士中文文献整理出版工作的快速推进，“西学东渐”及其与中国近代学术体系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新作迭出积累深厚；与之相比，“中学

西传”研究，尤其关于 16—18 世纪“儒学典籍”译介研究（以拉丁文文献为主）则相对薄弱。目前国内传教士“儒学西传”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以来华传教士的生平及著述简介为纲，介绍其在中国天主教史上的贡献，如方豪、阎宗临、徐宗泽等人的研究；（2）以国别及欧洲启蒙思想家为例，从哲学、宗教学角度梳理传教士译介的儒家思想在域外的接受与影响，如朱谦之、庞景仁、张立文、林金水等；（3）以传教士汉语文献为核心，从中国思想史的书写立场探讨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家思想的理解、诠释

与运用，如陈卫平、孙尚扬、李天纲、刘耘华、陈义海等；（4）以传教士外文文献为核心的文献综述及个案研究，如赵晓阳、孔令云、谭树林、李新德等先后针对来华传教士“四书”“五经”的译本篇目进行文献调查；吴孟雪、张西平、张国刚、吴莉苇等率先分析耶稣会士外文著述中有关中国宗教哲学、历史地理、政治体制及语言文字的介绍；从译介学角度分析来华新教传教士儒学译本（以英文文献为主）的研究更是大量涌现，王辉、岳峰、李新德等人的研究以史料收集及文本分析见长，杨慧林、谢天振、王克飞等



则致力于在理论深度上有所开拓。上述研究有首开先河之功，但其中涉及“儒学西传”的源头，亦即对于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拉丁文译著的介绍多为转引，未能直接从原始文献出发。这也导致国内的研究迄今无法深入地对比分析前期天主教传教士的儒学拉丁文译本与后期新教传教士英文译本之间的继承与断裂关系。

国外研究：欧美学界仍凭借语言优势和利用原始档案的便捷成为上述领域的研究重镇。他们率先编订、出版明清来华传教士中外文著述的索引目录，在此基础上涌现出艾田伯(René Etiemble)、毕诺(Virgile Pinot)、利奇温(Adolf Reichwein)、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人的史论名作。当代研究以原典分析为中心，研究视角上趋于多元：如最早梳理来华耶稣会士“四书”西译史并考证其翻译底本的孟德卫(David Mungello)；从比

较哲学视角考察耶稣会士“理学”观及其对儒学形象进行“理性化”建构的伦贝克(Knud Lundbaek)、郎宓榭(Michael Lackner)和詹启华(Lionel Jensen)；从接受史角度研究传教士儒学论述与莱布尼茨“自然神学”、沃尔夫“实践伦理观”相互关系的李文潮和秦家懿，以及在新教传教士理雅各的儒学译述研究上极具代表性的费乐仁(Lauren Pfister)等。但相关研究均未系统反思明清来华传教士群体儒学观的差异性及多样性。

## 二、选题的价值意义

第一，从比较哲学的角度看，本课题围绕“耶儒”异同以及儒家礼仪性质，对来华传教士在其译述中最早针对儒学宗教性的问题展开讨论，由外文原典出发总结其儒学观的多样性、矛盾性及理论依据，可进一步深化“中学西传”研究。

第二，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看，本课题有助于从中国自身的学术立场，打通明清天主教儒学拉丁文文献及新教英文文献，反观国外的研究成果并为之进行辩难，从而拓展中国宗教学研究范式，为汉语基督神学乃至传统儒学研究提供新思路。

第三，从传教士汉学研究的角度看，本课题注重天主教传教士拉丁文文献的整理分析，有助于揭示“儒学西传”源头的真实面貌，为中国学界的研究提供新材料。

第四，从跨文化译介的角度看，本课题借助传教士译介儒学典籍的真实历史经验，可丰富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个案研究及理论思考。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基本思路和方法

### (一) 主要内容及重难点

本课题以来华传教士研习儒家“四

书”的入门之作《大学》为主线，旨在对16—19世纪来华传教士的多部《大学》译本进行系统的文献整理，考辨多个译本之间系谱关系，所涉及的原始材料有：

来华耶稣会士的拉丁文译本

(1) 1592年《大学》拉丁文手稿

(2)《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 1662): 首个中拉双语刻印的《大学》译本

(3)《中国哲学家孔子·大学》(*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4)《中华帝国六经·大学》(*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1711)

来华新教传教士的英文译本

(5)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大学》译本(1812)

(6)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大学》译本(1814)

(7)柯大卫(David Collie)《大学》译本(1828)

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过渡时期的译本

(8)理雅各(James Legge)《中国经典·大学》(1893)

本研究的重点在于结合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依据不同的译者在翻译意图和文化立场上的延续及改变，逐部考察其译文的特点并总结其翻译策略，并对其儒学观的多样性及矛盾性进行分析。由此引出研究中的下列难点：

第一，整理外文手稿及刊本所需的文献学和版本学知识，并对多个译

本之间系谱关系进行考辨。

第二，儒家思想在跨文化译介中出现的意义嬗变及分析：早期“四书”的译者主要是来华传教士，在理解其译文时需对其教育背景、传教理念及群体利益有所了解，因此需掌握西方基督宗教、西方哲学尤其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相关知识；同时也要对《大学》一书的思想及其在儒学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尤其要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所作的注释有深入了解。

## (二) 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1. 本研究立足西文原典，通过系统梳理来华传教士的“四书”译介团队、多部《大学》译著的成书史、版本谱系、主要观点及其出版后的影响，有助于在全球视野下澄清早期儒学西传的具体进程，进一步完善儒学学术史的脉络梳理，弥补国内研究中拉丁文文本分析这一薄弱环节。

2. 来华传教士对儒学典籍进行跨文化译介时，会依据所处时代语境的需要，将不同文化体系中概念符号的“名”与“实”进行人为的“虚拟对等”，使其译介活动成为理念辩争乃至争夺中国问题发言权的手段。本研究将从共时及历时两个维度，综合考量来自不同修会的传教士译者如何译介核心儒学概念（“思想载体”）并分析其背后的翻译动机，一方面致力于打通中国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研究；另一方面利用“他者”的眼光提供审视自身的新视角，将明清来华传教士群体对于儒学的认知并与具有“本土意识”

的儒学研究进行辩难，开拓传教士汉学研究的新范式。

## (三)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1. 从传教士《大学》译本手稿及刊本的版本梳理及提要撰写起步，使用中西方版本学及校勘学研究法，厘清文献译述者的生平、考证其成书及刊刻时间，概括其主要内容并将其置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阐述其价值。

2. 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借助形象学及阐释学的方法完成文本细读：首先勾勒出16—19世纪传教士对《大学》文本理解、译介的真实情况，使各个修会内部以及不同来华修会之间儒学译述的系谱传承、相互借鉴抑或回应问难等隐含的脉络获得清晰化梳理；进而结合时代背景及其“接受视域”中的前见（经院哲学及神学训练、对中西文化意象不自觉的比附、基督宗教中心观等限制因素），解析来华传教士对待儒家文化不同态度的具体成因。

3. 综合考量不同儒学观的异同，运用“概念史”的分析方法，选取不同儒学观共同关注或是有明显意见分歧的儒学概念，反思传教士群体进行跨文化译介时，如何采取“以耶稣儒”“以史注经”“割裂或有意倒置概念的历史语境”等译介手法，实现儒学概念“名”与“实”的分离、重新建构并分配其新的概念意义，对其评判标准进行反思。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婍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mailto: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6556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